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

2
99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季刊

1992年第2期

(总第4期)

主 编:马大正

副主编:邢玉林

责任编辑:刘 逊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冯光美

1992年4月出版

专 稿

中国边疆研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使命

..... 林甘泉 张海鹏 何兹全 徐苹芳

李学勤 王庆成 王钟翰 马大正(1)

学者论坛

辽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林荣贵(12)

宋代汉族迁入岭南及其对南疆的开发

..... 刘美崧(27)

清代伊犁回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希隆(32)

清代海南开发述略..... 何 瑜(38)

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 秦和平(47)

辛亥革命前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

和攫取的经济特权..... 董志勇(56)

茶马互市与边疆内地的一体化..... 晓 舟(67)

乾隆帝进军西北失误续议..... 袁森坡(72)

从有关条约看澳门“附属地”问题..... 郑炜明(80)

当代边疆纵横谈

历史性的变革与当代边疆民族调查工作..... 刘先照(84)

探索与交流

中国东北与古代东北夷..... 傅朗云(87)

魏源《圣武记》所记格登山位置有误..... 王 波(89)

近代历史地理学家丁谦籍贯考辨..... 龚剑锋(90)

研究综述

清朝施政西藏及其研究..... 刘 为(92)

学者介绍

破除迷信追求新知的史学家顾颉刚..... 邢玉林(104)

学贯中西的史学家张星烺先生..... 冀 棠(107)

学术动态

赛加古城址——原苏联滨海边区境内的

重要女真文化遗存..... 林树山(110)

文献之窗

《中国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题解》评介..... 匡裕彻(112)

中国边疆史地若干古籍题解..... (115)

CONTENTS

SPECIAL CONTRIBUTION

-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and the Mission of Its Contemporary Scholars
 Lin Ganquan, Zhang Haipeng, He Ziquan, Xu Pingfang, Li Xueqin,
 Wang Qingcheng, Wang Zhonghan, Ma Dazhen (1)

SCHOLARS' FORUM

- Economic Cultivation of Northeastern Regions in the Liao Dynasty Lin Ronggui (12)
 Massive Immigration of the Han People into Lingna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After—effect for Cultivating the South China's Borderland ... Liu Meisong (27)
 Some Problems Regarding Studies of Station Troops and Uygur Peasants
 in Ili Reg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ng Xilong (32)
 A Brief Account of Cultivation of Hainan Island in the Qing Dynasty He Yu (38)
 Governing and Cultivating the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Qing Heping (47)
 British Economic Aggression against Tibet and Her Seizure of Economic Privilege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91 Dong Zhiyong (56)
 The Tea—for horses Trade and Integrity of Central Plains and Borderland Xiao Zhou (67)
 Successive Remarks about the Wrong Decision of Emperor Qianlong for
 His Order of Army Drive into the Northwest Yuan Senpo (72)
 Perspective on the Makao "Dependency" from the Treaties Concerned Zheng Weiming (80)

FREE TALK ON CONTEMPORARY BORDERLAND

- Historic Changes and Investigation of Contemporary Borderland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Liu Xianzhao (84)

EXPLORATION AND EXCHANGES

-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Its Ancient Tribes "Yi" Fu Langyun (87)
 Some Errors in Identifying the Location of the Gedeng Mountains as Recorded in
 "Chronicle of Imperial Military Campaigns" by Wei Yuan Wang Bo (89)
 A Differentiation of Native Place of Ding Qian—the Historical Geographer
 in Modern China Gong Jianfeng (90)

SUMMARY OF RESEARCH WORKS

-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Research Liu Wei (92)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

- Gu Xiegang — an Historian Doing Away with Superstitions and
 Seeking for New Idea Xing Yuling (104)
 Zhang Xinglang — an Historian Being Well Vers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Ji Tang (107)

INFORM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 Site of Saijia (赛加) — Important remains of Nuzhen (Jüchen) Literature
 in Primorye of Former U. S. S. R. Ling Shushan (110)

THE WINDOW OF LITERATURE

- A Review of " Explanatory Notes on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 Kuang Yuche (112)
 Explanatory Notes on Some Pieces of Ancient Literature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115)

中国边疆研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使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

林 甘 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与现实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也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正处于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可以说面临着更加繁重的任务。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是有争论的问题。不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了我国大片边疆领土,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通过边疆史地的研究,驳斥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者歪曲历史事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径辩护的种种谬论,帮助人民群众重温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那段屈辱的历史,激发大家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本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立志“要把我们的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帐,合法地承受这份我们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禹贡》出刊三周年《纪念辞》)。前辈学者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把边疆史地研究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发扬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公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近几年来,一些边疆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热烈讨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考古学的进一步发现和从理论上深入探讨文明的概念等等。无论如何,边疆地区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边疆地区的开发相对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是比较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直至今天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既要研究边疆地区的现状,也要研究边疆地区的历史。深入开展边疆史地研究,可以说是国情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前些时候,史学界曾热烈讨论过历史学的功能问题。许多同志指出,历史学应当满足时代的需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边疆史地研究对此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

我国早在秦汉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论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或今天的少数民族,都对我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正确阐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样

才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在这方面,边疆史地研究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于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加以阐述。是独立政权就不要说成是地方政权,是敌对关系就不要说成是友好相处。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汉族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各个割据政权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谁也不能把一些地方割据政权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同样,尽管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是客观存在,但民族友好和民族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时间有早有晚,但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一直存在着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而且到了清代前期(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已经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疆地区统一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一些外国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混淆民族与国家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汉族的历史当作中国的历史,妄图否定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组织开展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应该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以来比较冷落的局面已经有了初步改变,这是值得全国史学工作者高兴和祝贺的事情,我们期待研究中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林甘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近代边疆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张 海 鹏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极为明显的。谈到研究历史,我们有的人常常不愿意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为联系现实就缺乏学术意义。我在一篇参观珍珠港的随感中说过,从珍珠港事变5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以看出,历史并未成为过去,在一定的际遇下,历史会转变为现实。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我们再次看到历史与现实扭结在一起的状况。

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数万公里长的边界线。我们与毗邻的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问题。自60年代以来我国与一些邻国签订了和平友好的边界条约以外,我们的大多数边界还没有条约保证。缺乏条约保证的边界,往往引发不愉快的双边关系甚至国际关系。60年代至70年代间发生的中印边界作战、中苏珍宝岛事件、中越边境冲突,都是导源于边界的。海疆的边事纠纷,也常引起波澜甚至武装冲突,如钓鱼岛事件、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归属的争执。显然,这都是一些严重的现实问题,是一些关涉到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政治问题。

西藏自元代以来一直属于中国版图。但是,一些分裂主义分子数十年来一直在国外鼓吹把西藏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帝国主义分子也在制造“西藏独立”的谎言。西藏还有“麦克马洪线”问题。这都是些影响到中国与邻国关系,甚至构成国际交涉事件的现实政治问题。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的协议已经达成,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已无异议。但中英关

于香港的交涉并非一帆风顺,前几年一度变成两国间的敏感问题;就是协议达成以后,有关香港社会未来去向的若干问题,有时也引发争论。甚至美国用“最惠国待遇”迫中国就范,香港的美国商会则强烈表示要利用最惠国待遇维护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香港是中国南陲一弹丸之地,却是引发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敏感地区。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当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台湾与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明确方针。虽然“台湾独立”的主张一向为国人齿冷,但在台湾、在海外,总有一些无耻之徒在鼓吹“台湾独立”。一些有外国背景的台湾人把“台湾独立”写进竞选纲领,虽遭失败,并不死心。

以上所举,荦荦大者。这些都可归入影响中国现实政治的边疆问题。考察并研究这些问题的所以由来,都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的要追溯到明清时代,有的甚至要追寻遥远的古代。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蹴可就,而要靠国力的强大,靠内政外交政策的正确,靠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可以从历史的研究中提出种种有力的佐证,为解决这些问题尽到自己的责任。

近代中国,外祸频仍。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外祸史,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往往总是从中国边疆开始。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经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边衅频传,边疆危机,遍于全国,东西南北,稍无宁日。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东南海疆、西南陆疆,处处告警。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被俄国割占。英占香港,日占台湾,葡占澳门。东北、蒙古成为俄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后为日本)势力范围,福建成为日本势力范围,两广成为英、法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其下游是东南海疆,其上游是西南陆疆)。俄军占伊犁河谷达十年之久,且觊觎西藏;英国则乘日俄搆兵东北而染指西藏。掩卷长思,能不痛心?

我们看到,影响中国现实政治、周边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边疆问题,几乎都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关,都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关。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既与学科建设和发展紧密相关,也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仅仅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看成是与现实无关的学术研究,是缩小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党和国家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把研究的主力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主战场上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同好者,其勉诸!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边疆·史地

何 兹 全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绝大多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

中国边疆,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以内的边地疆域。历代王朝,常把自己称作中国,

而把和他们对立、在他们的疆域以外、而今日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以内的民族或国家称作四夷。如司马迁《史记》就称汉朝为中国, 揆匈奴等于中国之外。他们可以这样作, 我们却不可以这样作。今日我们所谓的中国史, 是中国今天国境线以内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如果我们把中国史说成王朝史, 即以当时他们所谓的中国为中国, 而把当时和他们对立今日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以内的民族置于中国之外, 是错误的。这是中国边疆史地的第一义。但又不要限于这一义。

中国历史上有些边疆民族的疆域跨有今日中国边境线的内外, 如汉唐的西域诸国, 有的在今日国境线内, 有的在外, 有的跨有内外。由于他们和当时的中国(汉唐)有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 虽然他们的活动区域已在今日中国边境线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要包括他们。这是历史问题。这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二义。

民族, 是个历史现象, 亦如氏族部落是历史现象一样, 有其始也有其终。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 是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的时代。那时代, 到处是氏族部落林立, 互相攻打, 互相吞杀。氏族部落间, 多有杀父之仇, 灭族之恨。这些氏族部落而今安在哉!? 父仇族恨, 又安在哉!? 民族亦复如此。民族国家是对封建国家而言的。欧洲中世纪, 国家是国王的财产, 两国王室的结婚, 两国便可结合为一国。国家作为王室财产而合并而继承。民族国家, 斩断了国家是王室财产的传统, 作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分割、占有而形成而出现。

这是就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意义而言, 但这并不排除许多民族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已经形成, 汉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一般并没有鲜明的自我民族意识。就汉族言, 历史上也只有“忠君报国”的国, 这个国又是和君、皇帝分不开的, 民族意识是模糊的, 不明确的。

民族既是一个历史现象, 我们就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间的融合、混合、同化, 是进步现象; 这也犹之氏族部落融合、混合、同化、消灭一样, 是历史的进步现象。

一般言之, 民族、民族国家, 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它也将与资本主义相始终; 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 民族、民族国家都会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逐步走向消灭。

历史上, 民族混合、融合、同化往往是走的压迫、强制、屠杀的道路, 这是各民族统治阶级所采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历史现象, 有始也必有终, 但民族融合、混合、同化、消灭, 必须走民族和睦、友爱、顺随历史发展、自自然然的融合、同化、一至消灭民族界限的道路。这是对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但民族融合、同化、消灭之道路是漫长的, 这可能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时代才能最后完成的, 决不能人为的操之过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要有明确的范围, 要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指导, 又要有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感。要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看问题。不能空想、冒进, 也不能落后。

(何兹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考古学

徐 苹 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门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从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边疆展开了广泛的所谓“考察”,大量搜集边疆的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地理、气象水文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古代文物。他们还在边疆史地的研究上散布了一系列的谬论,这些谬论的依据多与他们进行的“考察”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我国考古学家有责任与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共同协作,重新阐述中国边疆史地的若干问题。

中国边疆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边疆地区历史上的民族与现在居住的少数民族并不尽相同,搞清楚边疆地区古代民族迁徙变化的史实,是研究边疆史地的一个关键。考古学的发现对研究边疆地区古代民族的分布和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边疆既有北、西和西南的广大陆疆,也有东和东南的辽阔海疆。四十多年来,许多考古工作者在这些边疆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萨拉乌苏遗址,以发现“河套人”而著称,距今约5万年~3.5万年。1973年发现的大窑旧石器制作场遗址,把内蒙古旧石器时代文化提前到35万年以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则以东部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西部的阿拉善一、二、三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最为重要。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都已出现了铜器,使用了表示身份的礼器,说明上述地区正在向文明的社会迈进。有关匈奴、鲜卑、契丹和蒙古族的考古,在内蒙古地区都有重要收获,揭示了这个地区历史的实况。

新疆古代文化以细石器文化拉开序幕,它们分布在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边和罗布泊附近。距今3800年的孔雀河北岸古墓沟的墓地,距今2900年~2600年的和静县察吾呼沟墓地和轮台群巴克墓地及其出土遗物,分别代表着汉代以前新疆居民的文化和生活。从公元3世纪开始,在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是塞族、乌孙、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场所;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和吐鲁番盆地附近的古国,如车师、高昌、鄯善(楼兰)、龟兹、于阗、疏勒等,及其以后的回鹘、吐蕃,都在新疆留下了遗迹和遗物。考古发现为新疆史地的研究开拓广阔的途径。

西藏在吐蕃时期以前,便有当地的土著文化,以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最为重要。卡若遗址距今约5200年~4000年,居民从事粟作农业。拉萨曲贡遗址的年代比卡若遗址晚,居民也从事于农业经济,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详情尚待补充。西藏考古的新收获,对西藏地方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贡献。

宋元时期著名的港口城市泉州的考古工作,是海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后诸港遗迹的调查,宋代海船的发掘,以及泉州附近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遗迹遗物的调查。在宁波、扬州曾发现过一些外销和输入的瓷器、玻璃器等。在广州还曾发现过秦汉造船遗迹。近年还开展了水下考古学,正在南海从事沉船的考察。

以上所举诸例说明,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可以给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文献上所没有的史料及其深远的历史背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内容十分复杂。边疆地区考古几乎全部都与边疆史地有关系,考古发现中的许多问题,要靠边疆史地学者来解释。这两门学科要互相配合,共同协作,为进一步开展和繁荣中国边疆史地和边疆考古的科学研究而努力。

(徐莘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李 学 勤

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与近代史上我国边界屡遭侵削直接相关。许多学者愤于国难,立志开拓了边疆史地的研究领域,因而这一学科从来就有着现实的意义。当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累累,但不能不承认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补苴发展。充分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应该是继续推进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对于古代时期,与考古学的结合更为必要。

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近年国内考古学界的一项重要进展,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论的认识。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发展,都不是简单一元的,而是有种种不同的区系,互相交流融汇。以秦以前时期的考古研究而论,过去目光局限于中原一带,即夏商周三代王朝。即使是史前时期,涉及的地区也不广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客观上是当时调查发掘的范围有限,在思想上还可能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观念的影响,边远地区被视为无古可考的蛮荒之地。这样,考古学成果自然不会给边疆史地研究有太多帮助。

考古工作的大量事实证明,以往被斥为蛮荒的边远地区,古代的文化水平有时远高于多数人的估计。同时,这些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往,也比大家想像的要频繁得多。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谈青铜器与商文化的传布》的文章,指出商文化青铜器的发现地点,北到内蒙的西拉木伦河畔,南到广西,可见商文化传播所及的遥远。最近又有两项震惊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大墓,都属于商代。三星堆遗址是当时的蜀国文化,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而且还有规模宏大的城址。大洋洲大墓则属于吴城文化,所出青铜器、玉器尤有高度水平。两地文化都存在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影响痕迹,同时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是由那里影响中原的。这向我们揭示了我国商代文化的复杂面貌,也可看出那时中原王朝与边远地区的密切联系。

如果上溯到史前时期,情况便益发清楚。例如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近来已成为海内外学者探索的热门。特别是良渚文化,发现了土台建筑和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墓葬,在其玉器、陶器上又找到很可能是原始文字的许多符号,极其引人注目。有学者主张,夏商文化的不少因素均当溯源于此,包括流行于三代的饕

纹。

再举西藏为例,前些年昌都卡若的发掘,已使人观感一新。1990年到1991年,考古学者又发展了拉萨曲贡村遗址,有重要收获。这处遗址海拔超过3680米,包含有墓葬、灰坑,遗物除较多的打制石器外,有相当精美的磨制石器,如镰刀、镑、箭镞等,还有玉器和个别细石器。陶器制作水平也不低,例如有磨光黑陶。这里在下层地层中发现了一枚青铜镞,经科学鉴定,知道是以比较标准的青铜铸造而成。这个地层的碳14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1700年,和夏代相当(《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上述发现证明,我国边疆地区的早期文明是不容低估的。研究边疆史地,有必要深入考察那里的文化以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如有的专家所说明的,应该着重中国疆域的发展和变迁。在这个方面,考古学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永宁寺碑的研究,便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事例。对于边疆地区,还有必要多做系统的考古勘察。对我国境内和邻近地区的考古文化,还可以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这些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发扬光大,无疑将是有益的。总之,边疆史地研究是一种边缘性的学科,需要综合历史学、考古学等等方面的方法和成果,多角度地从事探讨。深切希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能成为各有关方面学者共同耕耘的园地,开放异葩。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近代史和边疆研究

王 庆 成

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边疆史地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作为两门不同学科的分类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因而研究的对象有互相交叉之处。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近代史学可以说是从边疆史地研究为开端的。

边疆史地研究有古老的传统,但作为专门的受人重视的学问却始于中国近代。19世纪以来,清代统治走向衰落。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火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领土、主权、利权日益受到侵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抛弃章句之学,把目光转向经世致用,转向研究边疆和了解外国,产生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不朽的著作。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边疆危机加深,学术界和其它爱国之士研究边界、边防、边政之风有兴无已;洵至20世纪上半叶,边疆研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有的大学还专门设立边政系,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并为法学院诸系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边疆史地研究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该中心除了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外,还组织国内其它单位的学者共同为推进边疆研究而努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国近代史

学科组在1986年确定近代边疆研究为重点项目之一。边疆研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高兴和钦佩的。但同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样,边疆研究可能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临怎样适应新时期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的课题。从上述近代时期边疆研究兴起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内忧外患唤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对边疆研究的重视,边疆研究密切联系着当时中国的实际而对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挽救民族的危亡起了一分作用。但新旧中国的“实际”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边疆研究除了因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有不少需要连续研究的长期课题以外,应该如何适应新的需要而具有新的面貌,这确是值得认真探讨、把握的问题。

事实上,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见解,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并且正在身体力行,做出成绩。其中如边界的研究,为国家的外交和边防作出了贡献。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崛起于世界,旧中国受欺凌宰割的时代早已结束,但若干历史上遗留的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仍有待解决。边疆研究者以边界问题和其它一些重要问题为重点,无疑发扬了边疆研究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是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割地赔款虽然早已是中国历史的陈迹,但从江泽民同志1990年春提倡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以来,大家对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有了新认识。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边疆史地研究同样有指导性。研究者要积极参加这种教育工作,并以深入的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为这种教育提供材料。这应是我们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又一类方式。

胡乔木同志1980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历史学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重视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这一建议符合历史学本身发展的要求,启示我们对传统的史地研究应加以丰富和革新。同时,研究包括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历史,有助于完整地认识“昨天”的国情,这也正是现实对于史学提出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宏伟任务中,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居于重要的地位,需要解决众多的较内地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历史学不可能研究现实的问题,但可以而且应该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这对于认识、处理现实的问题会有重要的帮助。边疆史地研究要为边疆地区的现代化事业服务,需要把研究边疆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历史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对边疆史地研究和近代史研究都是非常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共同努力。

(王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谈中国边疆史地学与民族史的关系

王 钟 翰

中国边疆史地学,既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又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边缘学科。它既需要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其前身为中国地理沿革)相互补充,又需要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互相配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总结各个民族盈

虚兴衰、消长成败的特点和规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中国边疆史地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古老学科。19世纪以来,英俄列强东渐,我国西北首当其冲,西北舆地之学勃兴。祁韵士的《新疆要略》和《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撰、何秋涛补的《蒙古游牧记》以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遂开风气之先。稍后,日俄东西交侵,东北疆域日蹙,忧国之士不遑朝处,筹边孔亟,东北舆地之学相继踵起。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际,三姓(今黑龙江伊兰县)地方的一位从七品州判官曹廷杰(湖北枝江人),以当时“后起之劲”、“首屈一指的史学家”,间关只身潜入被沙俄吞并的黑龙江北岸、乌苏江以东一带,沿江经伯利(一作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直达黑龙江口庙尔(今特林);返航上溯到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再折而东南沿乌苏里江越兴凯湖,抵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躬亲侦探,历时近半载。所过之处,“凡彼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今日边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以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称史书之阙者”(见《曹廷杰集·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一一默记于心,归而录出,共得118条,撰成《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以视一个半世纪以前图理琛的《异域录》,不特不稍为逊色,而又有以过之。《西伯利东偏纪要》与《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是曹廷杰在我国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三部杰作。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金毓黻(辽阳人)以东北人一人之力,治东北舆地之学,先成《东北舆地释略》4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再补撰《渤海国志长编》80卷。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后,金氏间关南行,执教于四川三台东北大学,讲授之余,撰《东北通史》一书。是书以东北三省自先秦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为主线,痛斥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满蒙学派为“满蒙独立”而捏造大量的所谓“历史根据”的无耻澜言。金氏著述甚富,据估计,不下数十百种,而手写《静晤室日记》,起1920年迄1960年,40年未尝中辍。此日记取法于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即“匪惟谈理治学之语,层见迭出,即所作诗文亦悉以入录,作日记读可,作全集读亦可”。实则李、金两人之日记又匪特个人言行录,也是有关当时当地社会历史记录的第一手资料。

前述曹、金诸位前辈治西北、东北舆地之学者都竭毕生之力,历经艰辛,其所成就不为不大,然亦只涉及西北或东北,最多再加上整个北方内外喀尔喀蒙古,而西藏及甘青地区与广大西南地区,以及中南沿海诸岛屿尚未包括在内。即以东北一方言,固然必须读经史诸子百家之书,也应借助于日、俄、英、朝鲜语文以及满、蒙、锡伯、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少数民族语文;其它如考古、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似亦不可或缺。东北如此,西北、西藏、西南、中南何尝不也如此,又岂一时一人之力所能毕其功?

(王钟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马 大 正

中国的边疆研究渊源漫长。但中国边疆研究的兴盛,则是近代以降的事。鸦片战争之后,曾出现过边疆研究两次高潮。第一次时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闭锁的清帝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徐继畲、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深感大清帝国国运日落,为捍御外侮,巩固边防,乃发愤潜心于边疆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抒发国人之爱国热诚。他们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此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用群星灿烂形容此时研究发展盛况,并不为过。仅以疆域史和边界史研究为例,20年代至30年代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谢彬《中国丧地史》(1925年),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年)和《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1931年)。之后又有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史》(1944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年)等。这些著作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开创性作用和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今,我们正面迎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这次高潮可以说是经过建立4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发展的扎实准备的基础上而出现的。

面对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概言之是:继承与开拓,即继承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开拓边疆研究的远大前程。继承与开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离开继承,开拓成了无源之水,没有开拓,继承也失去了存在价值。为了更好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清晰认识继承对象和开拓目标是十分关键的。为此至少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身体力行去努力实践的。

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宗旨。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史漫长而曲折,但研究的时代使命感和应用性始终是促使研究者上下求索的原动力。在古代,学者们(相当多人同时也是政治家)专心研究边疆问题是为了总结国家兴衰的经验,是为察古而知今(当时的今),到了近代,救亡图强则成了研究者们首要的、急迫的、力图实现的目的。尽管从总结盛衰经验到寻求救亡图强良策,即从研究的社会背景、对象、方法、效应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这种变化中还是有着可供我们批判继承相通共性——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指导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思想,也是这项事业留给今人,且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应予继承的宝贵遗产。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我们的继承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的批判。在当代,对于边疆研究工作者来说,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促进边疆社会发展。这就是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工作宗旨。

其次,要有优良的研究学风。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求真求善的优良传统。从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起,求真求善即成为每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司马迁的

求真即要使其史书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①；而求善则是希望通过修史而成一家之言，即通过再现历史的精神来展现自己的精神。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求善才能得到经世的理论体系，致用则是要使理论研究达到实用的目的。

在古代，边疆史地研究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上述两个特点。由于边疆问题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种种密切的关系（包括影响十分广泛的民族间和好交往与流血战争，历朝政府的戍边和实边活动，以及商贸和交通联系和人口迁徙等内容），所以促使边疆史地研究往往比其他类型的史学研究有着更强的上述特点。到了近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的挑战促使更多的有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也有其他类型的人）投入边疆研究的行列。求真求善与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光大。

在当代，边疆研究工作者要在充分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求真求善为科学的实事求是；发展经世致用为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只有在这样的科学的学风指导下，中国边疆研究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第三，要有完整的资料基本建设计划。如果说理论是研究的灵魂，那么，资料则是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资料浩瀚如海，一部二十四史和众多地方志即保存了大量前人边疆研究的宝贵成果。这一切都是今天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要继承前人丰硕的遗产，就要下大力气收集、整理这些学术遗产。为此，一要认真进行理论资料积累，既要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边疆、边界问题的论述，也要收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二要有计划进行资料索引的编纂工作；三要抓紧边疆古籍的影印与整理；四要有选择地进行有关重要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著作的汉译。以上这些工作费时费功，决非尽一人一时之功所能奏效，必须加强协作，发挥整体的力量。这项工作见效之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走向腾飞之日了。

第四，要有多学科的通力协作。中国边疆发展史十分悠久，早期文明时期的边疆至少有两千年的发展史，统一多民族国家时期的边疆发展史又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历程。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法律诸领域，近代以来又与外交、国际法等领域紧密相联。因此，中国边疆研究是一门与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政治学、外交学、法学、地理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的边缘学科。仅以历史学而言，历史学中的考古、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民族史、世界史等专门分支学科都包含有与边疆史相交叉的研究内容。因此，要使中国边疆研究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多学科专家们通力协作的局面，充分吸收诸学科的研究精华。当中国边疆研究真正继承发展了相关学科的成果时，一项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的登上学坛也就为时不远了，而这恰恰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栏编辑刘逊

①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辽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林 荣 贵

这里所表述的辽代东北地区,主要指东京道的辖区内。其地望大致西界上京道东边,即以鸭子河(今嫩江下段)及其两端向南向北伸延的大体线段为界;东至北海(今鄂霍次克海)、东海(今鄂霍次克海南部至日本海);南临辽海(今渤海)以及鸭绿江以南的保州、宣州两城连结点向正东伸延至与高丽相邻的大体界线上;北至外兴安岭。大致包括今我国东北三省、俄罗斯外兴安岭至海滨地区及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东北一隅之地。

东北地区境内有平原、山区、草地、江河、海洋,主要河流有辽河(今东辽河)、鸭绿江、混同江(今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段)、鸭子河(今嫩江下段)和纳水(今嫩江上段)。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已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尤其是唐代渤海王朝时期,虽然有关史籍记载濒于空白,但仍可寻到某些痕迹。

一、文献上反映的辽以前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痕迹

唐代前期,东北地区主要生活着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和高丽等族。黑水靺鞨在北,粟末靺鞨居南,或与高丽杂居。黑水靺鞨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有明显的发展。如“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气蒸白盐凝树颠”^①。但用于渔猎的“矢石鏃”,仍然保留了先人的“楛镞遗法”^②。高丽族,主要生活在今辽宁中部、南部至朝鲜北部一带素称富庶地区,“种田养蚕,略同中国(中原)”^③。各种产业已达到相当发展水平。虽然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但从某些间接文字中有所启示。如贞观十九年(645年)四月,唐师东征高丽,“李世勣等拔盖牟城(今辽宁沈阳陈相屯塔山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④。五月,太宗李世民亲自帅师攻下高丽的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⑤。此次战役,唐师未完全取胜而西撤,却从高丽方面“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⑥。高丽没有被强大的唐师所灭,有多方面原因,但与其有比较充足的粮食和其作战物资如马匹、器械等源源不断的供应不无关系,这些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本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7世纪末,粟末靺鞨建立了渤海王朝(698年~926年),同时并入了辽东等地区的高丽族和北部的部分黑水靺鞨等族。渤海王朝作为唐朝辖区内(渤海王朝辖区原属唐朝的河北道)的属邦在东北地区经营了长达200多年之久。渤海王朝重视生产事业,中央政府机构中即有掌管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的职官。如相当唐朝司农寺的大农寺,主要负责“掌管全国仓储、营田等事宜”^⑦。相当于唐朝户部的仁部,主要员责“掌管土地、钱粮、贡

① ②《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③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④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

⑤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⑥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

⑦ 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06~108。

赋”。相当于唐朝工部的信部,主要负责“掌管王国的交通、水利、屯田、建筑工匠等事宜”^①。由于生产事业与财政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些部门在中央职能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难得保存下来的一些史料中,针对渤海国时期东北地区名优产品记述说:“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鄆頔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轴,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涓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②。反映了渤海境内经济发展在地区分布上比较广泛,东至海滨龙源府,西抵扶余府,南临南海府,北达涓沱湖(今兴凯湖),均有其名优产品;经济门类也比较齐全,农业、畜牧业、渔猎业和手工业,均有较大的发展。有些产品,如畜产品的马,金属品的熟铜以及其他土产、名产品,频频运入内地与唐交聘交易,有的还远销到日本等地^③。

上述表明,在辽统一东北地区以前,该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贸业等已有一定的基础。一般地说,在南半部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地区,产业优势主要在于发展农业,也兼营畜牧业、渔猎业和手工业;在北半部水草充足地区,产业优势主要在于发展畜牧业和渔猎业,也兼营农业和手工业。辽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利用这些优势实行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二、辽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辽朝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中央政府整个经济发展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辽廷从其长远的经济战略出发,对东京道地区的生产事业采取了与军国要务一视同仁的态度。特别是军政活动与生产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往往网开一面。如会同元年(938年)三月,太宗耶律德光准备带领大队人马到东京(今辽阳市)境内行围打猎,掌管三剌军的大臣考虑到当时东京各地“农务方兴,请减辍重,促还朝”。太宗觉得言之有理,“诏从之”^④。辽帝行围打猎,不只是游乐,更重要的是“练习武事”^⑤。以国家重要军事活动为之让路,从中可以看出辽廷重视东京道地区生产事业的一个侧面。

其次,辽政府对东京道地区,尤其是对基础较好的原渤海南部的生产事业,采取了某些优惠措施。史载“东辽之地,自神册(916年~921年)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⑥。通过减征或免征若干税收,对本区有关生产和经营事业松绑,达到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这项优惠政策,从神册(916年~921年)到太平(1021年~1031年)年间推行仿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以前^⑦,至少行用达百年以上。

再次,辽政府在东京道地区推行了扶植农业和其他生产事业的“赈济”措施。如统和元年(983年)九月,圣宗“以东京……旱、蝗”受灾,“诏振(赈)之”^⑧。统和十六年(998年)四月,圣宗下诏“振(赈)崇德宫所隶州县(即东京道之乾州、双州、贵德州及其所属各县)民之

① 王承礼:《渤海简史》,页106~108,同前注。

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③ 参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1980年),页279。

④ ⑦ 《辽史》,卷59,《食货志上》;又卷4,《太宗纪下》。

⑤ 同上书,卷4,《太宗纪下》。

⑥ 同上书,卷17,《圣宗纪八》。

⑧ 同上书,卷10,《圣宗纪一》。

被水(灾患)者”^①。太平十一年(1031年)闰十月,辽廷诏“振(赈)黄龙府饥民”^②。大康二年(1076年),“辽东饥,民多死”,东京户部使王棠“请赈恤”。道宗诏“从之”^③。大康四年(1078年)正月,道宗下诏“振(赈)东京饥”^④。大安二年(1086年)六月,辽政府“出粟振(赈)辽州贫民”^⑤。十一月,又“出粟振(赈)乾、显、成、懿四州(引者按:成州属上京道,其他各州属东京道)贫民”^⑥。大安四年(1088年)四月,以东京地区受灾故,道宗下诏“振(赈)苏、吉、復、洙、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⑦。大安八年(1092年)十一月,辽廷“以通州潦(辽)水害稼,遣使振(赈)之”^⑧。寿昌(寿隆)五年(1099年)十月,道宗下诏“振(赈)辽州饥,仍免租赋一年”^⑨。辽廷除了对一般受灾或由于其他原因贫困的州县实行济困恤贫外,还采取措施匡扶那些无力发展生产的部族或边远地区民户。如统和三年(985年)十一月,圣宗“诏以东北路兵马监军妻婆底里存抚边民”^⑩。重熙十年(1041年)二月,辽廷“诏蒲卢毛朵部归曷苏馆户(南徙女真)之没入者使复业”^⑪。除此之外,辽政府还在东京道地区内广置和籴仓,以利于济困防灾。史载“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⑫。通过和籴仓方式,既减轻政府赈济上的负担,又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起一定的扶植和调节作用。

还有,辽廷设置或委派专业职官加强管理东京道地区的经济事业。如主管农业生产方面中央南面官中置有司农寺^⑬。这是个仿唐拟宋的官署,其具体职掌是主管农田水利、园池果木、粮食积储等事。司农寺长官为司农卿,副长官为司农少卿。辽朝根据发展东京道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司农寺不仅中央置,东京道也置。东京道置司农寺,《辽史》和《契丹国志》等书均失载。据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萧裕鲁墓志铭》中记述,辽廷派“遣东京警巡使、司农少卿张可及”为治表萧裕鲁之“敕祭使”即是一证^⑭。按照当时职官衔列的顺序,此司农少卿非挂朝职,而是东京道司农寺之副长官。在这通墓志中,还记述朝廷同时派遣“司农少卿知辽西州军州事杨恂如”为治表萧裕鲁之“敕葬使”。辽西州属于东京道显州的属州,杨恂如之“司农少卿”实为挂朝职,而张可及之“司农少卿”却是实职官,是专门负责东京道地区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联系的事业的专官。杨恂如以中央司农寺副官之职出任东京道显州属下之辽西州知州,也应与重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有关系。通过两任职官例子,可以看出辽廷加强管理东京道地区农业生产的某些侧面。辽廷对东京道地区的盐

① 《辽史》,卷14,《圣宗纪五》。

② 同上书,卷18,《兴宗纪一》。

③ 同上书,卷105,《王棠传》。

④ 同上书,卷23,《道宗纪三》。

⑤ ⑥同上书,卷24,《道宗纪四》。

⑦ ⑧同上书,卷25,《道宗纪五》。

⑨ 同上书,卷26,《道宗纪六》。

⑩ 同上书,卷10,《圣宗纪一》。

⑪ 同上书,卷19,《兴宗纪二》。

⑫ 同上书,卷59,《食货志上》。引文省略有乌、春、泰三州,应属于上京道,但文中所载主要属东京道事。

⑬ 同上书,卷47,《百官志三》。

⑭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9。